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指从中国出发,向东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西到达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地区,最后可达西亚和东北非地区的海上交通贸易线路。

东海航线的重要节点,是位于山东的登州港。以此为起点的“登州海道”(《新唐书》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并列为我国历史上两大“海道”,它肇始于先秦,发达于汉唐,直至明清,一直是东部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海上通道。

海运枢纽,对外窗口

黄海,东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进行航海交流的海域之一。登州,蓬莱的古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始海外交流,丝绸以及青铜制造、冶铁等技术相继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汉时期,汉武帝不仅“西进”,而且“东出”。在“张骞凿空”的同时,汉武帝拓展了两条海上贸易之路:一条是南海到印度洋的航线,另一条就是以登州港为起点,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航线,即史书所说“循海岸水行”的航线。当时,登州港一带已经承担输送“移民”“贡使”和“货物”的多重使命。此后数百年,这条航线都是官方往来的必经之路。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设蓬莱镇,神龙三年(公元707年)设蓬莱县,登州治所移至蓬莱,登州港政治地位崛起。到唐朝中期,登州港已成为北方第一大港,与泉州、扬州、明州等港口齐名。

据统计,日本先后派出的4批遣唐使,都是从登州登陆,到了唐朝,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近20批,其中不少是走东海航线,由登州港中转。

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往来更为密切。登州曾设有“新罗馆”“高丽馆”,用以安置从登州入境的新罗、高丽使节。据学者研究,新罗以各种名义向唐朝派出使节126次,唐朝也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

这与特殊时代背景有关。新罗于公元675年统一朝鲜半岛,此后全面学习大唐。除了直接采用唐历法外,还设立医学、天文、历法博士,研究唐朝相关知识。从公元788年开始,新罗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并将《左传》《礼记》等中华典籍作为考试内容。

此后,随着交流日趋频繁,印刷术、造纸术、纺织术以及火药等,经海路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及世界各地。这一过程中,登州港发挥了重要作用。

蓬莱阁景区管理中心文物部副部长刘莉表示,据统计,新罗留学生中,在唐朝考中进士的就有58人。一方面,很多图书文献从登州港装船运往新罗;另一方面,一批新罗留学生经登州港到大唐学习。“这种文化交流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凸显了登州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是登州保持千年繁华的重要原因。”

在经贸方面,登州港同样不容小觑。当时,有许多新罗商人在这里从事对外贸易。例如,新罗人张保皋就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船队。他将新罗的金银工艺品、药草等运抵登州港,再转销中国内地。同时,他又从中国南方及内地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经登州港转运至新罗,销往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登州港除了具有航运功能,还是迄今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海防港口。早在汉武帝时,朝廷即派遣楼船将军杨仆由此出发,经海路过渤海海峡,讨伐当时的朝鲜王卫右渠。魏晋时期,魏明帝派司马懿攻打辽东公孙渊时,水路即从登州一带出发。隋唐时期,朝廷曾多次派战船从登州港出发,渡海征讨百济、高句丽。宋朝又在此地设置刀鱼寨,以对抗北方日益强大的契丹政权,从此登州港有了军港功能。为加强海防,明洪武年间,设立水城,四周围以土城;万历年间,又给夯土城墙包砖加固。此后,登州港成为抗倭援朝的后勤基地。

在登州古港,寻「海丝」繁华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蓬莱水城

古船见证文明交流互鉴

在延边大学教授李东辉看来,登州港成为东海航线的始发港,原因是多方面的。“唐朝时,我国沿海地区的船舶制造以及航海运行技术得到了提高,这也推进了登州港的成长。”

李东辉表示:“登州港地理位置优越,不仅三面被海包围,与长安、洛阳等地之间,还修筑了发达的来往道路。这使得无论是通往海外,还是到达国内重要城市,交通都非常畅通。”正如明朝宋应昌《重修蓬莱阁记》所说:“至若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达,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

另外,有“齐鲁冠带衣履天下”之称的山东半岛,较早掌握了养蚕织绸的技术,而丝绸是当时外贸的“硬通货”。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齐州济南郡出产丝、葛、绢、绵、防风、滑石、云母,登州东牟郡、莱州东莱郡出产贯布、水葱席、石器、文蛤。这些商品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货,为登州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难能可贵的是,登州港经过历朝精心维护,至今仍在使用。新中国成立后,登州港先后经历三次大规模清淤,分别是1957年、1984年和2005年。

在1984年的清淤工程中,蓬莱县文化局和烟台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港湾西南隅2.1米深的淤泥中,发现了3艘古代沉船。因受客观条件限制,只清理出1艘元朝古船,即蓬莱1号古船,其余作回埋保护处理。

2005年,蓬莱市文物局,烟台市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原古船回埋处进行考古发掘。这一次,先是发现一艘长21.5米的明朝战船,保存有龙骨、前桅座、舱壁和外板,即蓬莱2

在蓬莱3号古船内,发现了高丽镶嵌青瓷碗、瓷罐、茧形壶、陶瓮等文物。镶嵌青瓷是在青釉上镶嵌白色纹饰,具有典型的朝鲜半岛风格。韩国学者研究认为,其中2件文物具有高丽后期镶嵌青瓷衰变期的特征,这为文物断代提供了依据。“高丽镶嵌青瓷的发现,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证明高丽海船装载镶嵌青瓷,自登州海路输入中国的史实,为朝鲜半岛古代瓷器输入中国,提供了海路输入的实物依据。”袁晓春介绍。

如今,4艘古船陈列于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蓬莱古船博物馆)。该馆是目前我国陈列古船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我国唯一陈列有外国古船的博物馆。该馆以“登州古港”“蓬莱古船”为主题,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起源、发展变迁、港口历史文化为脉络,运用雕塑、壁画、模型、场景复原等多种展览手段,集中展示了古代船只的制作、古船历史,以及登州港的繁荣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魅力。

除了四艘古船,博物馆还珍藏着紫檀木舵杆、黄花梨造船木、木锚、云龙纹瓷罐、牡丹纹执壶、碗

号古船。随后,在1米外,又发现几近并排的蓬莱3号古船。该船东西走向,头西尾东,左倾斜沉于黑色淤泥中。后来,在该船北部数十米处,又发现蓬莱4号古船残身。

这4艘船中,以蓬莱3号古船最为引人关注。该船的船底板用木栓连接,舷板用木钉连接,中央底板未设粗大的龙骨。从船型到结构,与以往发现的中国古船都不同。专家研究认为,这是一艘制作和使用时间为元朝,沉没时间为明朝的高丽货船。

蓬莱3号古船采用平底设计,形态短而宽,这使得它在近海航行时更加稳定,同时也便于在狭窄水域中操作。“这种设计对于大规模的货物运输十分有利,尤其是在东海航线这类繁忙的贸易路线上。”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晓春认为。

另一个有趣特征是,它采用了水密舱技术。该船发现了5道隔舱壁及4道隔舱壁遗迹。由此可知,9道隔舱壁,将船体分为了10个船舱。水密舱是中国发明的造船技术,在江苏如皋出土的唐朝古船上,就已发现实物,文献最早记载则见于《宋书》。其作用是,当船舶遭遇意外,船舱少部分破损进水时,其他尚未受波及的水密舱,还能提供船舶浮力,从而减缓下沉。另外,水密舱也可规划成多用途的空间。朝鲜半岛的古船多采用加木和驾龙木,来增加船体强度,却未见有隔舱壁。

蓬莱3号古船是一个特例。中国已发现的100多艘古船,都没有相同船型;朝鲜半岛发现的古船,也没有与它相同的结构。这一融合两国造船技术的特殊构造船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韩国媒体曾多次到蓬莱采访拍摄,并播出了电视专题片。

“你来我往”的瓷器贸易

口炮等文物,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比如云龙纹瓷罐,出土于古船。这件元朝磁州窑瓷器,以鲜明的褐色线条,勾勒出云龙纹和凤纹,与米白色的背景,形成强烈视觉对比。整体来看,制作精良、图案独特,展示了磁州窑工艺的高超水平,以及当时民间艺术的鲜明特色。磁州窑是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之一,其产品曾在辽宁绥中沉船和韩国新安沉船中发现过。

“这件文物不仅证实了登州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性,而且揭示了中国北方窑口产品的广泛分布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它的发现,体现了当时登州港在东亚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及中国瓷器作为贸易商品和文化使者的角色。”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修琳琳认为。

历史文物不仅要保护好,还要发展好,利用好。近年来,该馆对古船进行了保护性修复,通过技术措施,增强船体的稳定性和结构的完整性,延长船体寿命。当地还深挖历史资源,加强文旅融合,开发《丝路情缘》《戚家军魂》《东坡吟诗》等特色节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历史故事,感受海洋文化之美。

让文物在“出差”中获得更多共鸣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全国多地博物馆再次迎来参观热潮。不仅观众络绎不绝,众多珍贵文物也纷纷“出差”,跨城助力展览。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亚丑钺就奔赴北京,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出两个月,因反响热烈而延长展期;接棒它“出差”的,是山东另一件重量级文物——祖辛方鼎。

类似的情景,正在全国多家博物馆上演:河北博物院院长信官灯在天津展出时,观众为“一睹芳容”而大排长队;四川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文物频频外出展览,成为“出差搭子”;上海古埃及大展中,近八百件埃及文物更是实现了跨国“旅居”。

数字化的今天,尽管虚拟网络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阻隔,但实体文物展览所带来的文化体验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面对一件穿越千年的实物真迹,观众所感受到的直击心灵的震撼,是任何数字复制品都无法给予的。文物“出差”,将这种珍贵体验带给了更多观众,让他们得以面对面感受文物的独特魅力,进而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及艺术价值。

随着大众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来博物馆,已经不再限于打卡、猎奇,而是转向追求知识汲取与情感共鸣。文物“出差”热潮回应了当下日益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可谓恰逢其时。



信官灯到天津“出差”

文物跨地域流动展出,不仅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解读视角。如同一个个“漂流瓶”,当一件文物离开原收藏地,进入另外一个文化语境中,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往往会被重新激活与诠释。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宋孝宗赵昀手诏卷》前往浙江嘉兴博物馆展出,不仅串联起嘉兴籍皇帝宋孝宗与嘉兴籍收藏家项元汴的历史故事,也为观众打开一扇窗,去触碰文物背后的时代脉络。这些千里跋涉的文物,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迁移,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更深层次看,文物“出差”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有效流动,促进馆际交流。例如,江苏省推出的“文物大展环省行”活动,汇聚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机构的“镇馆之宝”开启巡展。每至一城,便邀请当地博物馆的珍贵文物“联袂登场”,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国宝文物,也为地方馆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机会。这种馆际交流打破了顶级文物多集中于大型博物馆的局面,推动了文化资源的下沉与共享。

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清代广钟专题展上,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文博机构纷纷出借珍品,让广州市民得以近距离感受宫廷艺术的精妙绝伦。国家博物馆则将馆藏德化白瓷展送至新疆哈密,为边疆群众带来一场纯净典雅的文化盛宴。这种跨越千里的文物交流,让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条件的观众都有机会接触到优质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化鸿沟。



山东博物馆的“祖辛方鼎”

此外,文物借展不仅带来短期人气,更长远促进了博物馆整体的展陈水平。一些地方小馆,因为受限于文物资源、展陈条件等限制,一度相对冷清。为迎接外来珍贵文物,地方馆往往需要提升自身的展陈条件,包括温湿度控制、安防系统和展柜设备等。同时,通过与大型博物馆的策展合作,地方馆也可以学习到先进的策展理念、传播策略与公众服务经验。事实上,文物“出差”受到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契合了一种集体需求:历史不应被封存于玻璃柜中,而应在不断的解读、传播中,融入新的内涵,焕发新的活力。

当然,文物“出差”要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文物运输的安全风险、借展成本分担、展览主题同质化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问题解决路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物“出差”带来的放大效应已经显现。当更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当一座小城因一件文物的到来而沸腾,文化的生命力就已经得到了最生动的彰显。



师者不老:超越时间的教育生命

□ 本报记者 石念军

传统职业生涯规划往往将退休视为工作的终点,对于教师尤其是那些真正具有教育家精神的人而言,退休之年反而愈加精彩:著述、讲学、座谈……诚如我们在诸多公共文化生活中所见,一大批资深教授“退而不休”,以精彩的学术表达和超越学术的人文精神,赋能大众生活的文化传播和思想建构。

视教育为生命的存在方式,而非谋生手段。或许,“师者不老”现象恰恰蕴含了教育家精神的人本内涵。

无止之境

张述铮先生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退休教授。由他担任总主编,联合300多人,历时30多年完成的3000多万字的《中华博物通考》,即将正式出版发行。

张述铮先生生于1936年,今已89岁高龄。可以说,这一套填补中华民族文明史原创性博物百科全书学术空白的皇皇巨著,贯穿了他迄今为止的整个退休生活。

查资料、誊写书稿……30多年间,从起床到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偶尔外出考察、调研或电话调度工作,张述铮总是伏于案头,倾心编纂通考。

所谓“学无止境”,这一时期的张述铮实际已经通入了“无止境之境”。而在山东,这样的老教授还有很多,比如吕家乡、宋遂良、李衍柱、袁忠岳、李伯齐等。

把治学融入生命,以治学为生存方式。“要完成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承诺的《思孟学派美学思想研究》,开始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整理好初步设计的六卷文集。可先出一本新世纪以来的自选集。以此诸件实事,迎接80岁的到来!”2012年元旦,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退休教授李衍柱曾经如此自勉。如今13年过去了,李衍柱先生迈入93岁高龄,曾经的治学规划也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40年前曾受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吕家乡教授。当时,他折服于恩师的良善与谦逊,于今则折服于恩师的老而弥坚。

吕家乡先生生于1933年。如今在山东师范大学校园内,仍时常可见这位92岁高龄的瘦弱老者,手持杖杈颤巍巍地走进专题座谈,学术研讨现场。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30多年,晚年生活更曾遭遇重大挫折的他,从未停止读书、思考和著述。《孔孚“传虚宇宙”诗歌创作的追求和艺术得失》等理论新作的不时推出,每每让人慨叹这位九旬老者的学术生命力之旺盛。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荣幸,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遁入“无止境之境”的老先生们,实际早已把“学高为师”的治学精神,潜移默化化为“身正是范”的师道精髓。

忘我之心

所谓“身正是范”,“身教”重于“言传”。于垂老之年纵览他们的一言一行,最让人感动的甚至不是其学术造诣的精进,而是那种发自肺

腑、表里如一的纯粹与本真。

“没有任务的要求,更无任何功利的目的,一切的研究完全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和生命的表达;因此不下妄言,不溢美,不讳恶,好则说好,坏则说坏,客观公正。”罗振亚感叹吕家乡先生为学为文的评价,实际暗含了对恩师为人的终极肯定。

更重要的是走出书斋,积极干预现实生活。91岁的宋遂良今已离休31年。一个共识是,倘若从更大范围或社会影响来讲,更多人知道和了解宋遂良先生正是在此期间。

1994年适逢中国足球职业化元年,宋遂良独具一格的“教授评球”一时享誉绿茵场内外。此外,他的各类文化时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以人文视野建言城市发展;出席各类文化活动,不吝为每一种真善美鼓与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诤友”吕家乡以为其兴趣太过广泛,而影响了学术生涯的纵深生长;89岁的袁忠岳教授则直指其“心太软”,不懂得拒绝。

其实哪里是“不懂”,而是不“忍”罢了。有爱才有责任,恰恰是对师道精神“仁而爱人”的深刻理解和倾心追求,让他们更加希望能够以高尚人格,感染人、影响人、感召人,自觉做为学生的人的师者垂范。

正如有受访者说,退休后反而有了更完整的时间思考教育本质问题,能够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反思层面。同时,时间层面带来的解脱感和年轻态,也能够让人在更加宽松的环境里释放自我,从而真正做到“我将无我”——摒弃功利,在奉献自我中实现自我。

“我将无我”方能成就大我。大概也正是因

此,才会有人感叹他们“为人为学之真,于今已不多见”,并将他们视为身边的“大先生”。

不老之魂

教育不是职业,而是使命。使命没有退休年龄。

有受访者也曾谈到这样一种观点,这些老先生是学生们的好老师,也是老师的好学生。

这一逻辑换位实际暗含了教师职业独特的时间特征和发展轨迹:每一代学生都是教师生涯中新的开始,教师则通过与学生互动不断重新体验教育的初心。

山东师范大学去年曾经为历史上的名师塑像。塑像落成之时,吕家乡、宋遂良、袁忠岳、魏建等资深教授,专程从市区赶往长清湖校区拜谒先师田仲济先生。

循环而非线性的教育时间,赋予师道精神一种特别的传承之力,推动师道精神在传承之中螺旋式上升。

也正因此,“师者”的影响始终延续和升华。当他们将工作与生命完全融合,倾心“做人”而不止于“做事”,他们已然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文化传承者,以及师道精神的切身布道者和践行者。

师者不老不是神话,而是对师道精神有着深刻理解的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教育实践,进而创造出一种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教育形态,迸发出周而复始的传承力量。

师者不老,生生不息。所谓师道永昌,大抵如此吧。